

近代“文明”话语的两副面孔

□ 王锐

辛亥革命前十年,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东渡日本。他们目睹琳琅满目的由日本学者翻译或撰写的西学论著,感到很有必要把这些新学说介绍到中国来,以此促进国内的变革。而不少赴日本学习被视为治国要道的法政之学,在政治立场上与清廷保持合作关系的留学生,确实也得到了清政府的重用。与之相似但又变本加厉的是,少数赴欧洲的青年知识分子,受到彼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认为当务之急是破除一切国家形式与文化遗产。或许是他们心系故国之心未泯,遂将批判的矛头从欧洲转移到中国,以追求文明、进步、科学的名义对中国传统与中国社会大加抨击,认为这些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理想的重要障碍。一时间,讲求新学,以新为尚,成为当时知识阶层的一个显著特征。

鲁迅描绘出这样一幅当时的文化场景:社会上讲求西学之人越来越多,声音也越来越响亮,这让那些来华的外国人不禁感叹中国的维新事业开展得这般如火如荼,而中国的知识阶层也频频效仿西人之言行,主动与西人谈笑风生。而那些掌握了些许西学的人士,频繁利用各种媒介向国人进行“启蒙”活动,唇焦舌敝地宣称如果大多数民众不追随他们的步伐,中国将难以走出困境。

在鲁迅看来,这样熙熙攘攘的场面恰恰体现出中国知识阶层的某种病症。因为一个人的主张应该是其心声的自觉流露,是通过独立思考而来的,面对各种流行于世的学说,一个人应该基于深入思考与独立判断来择别,而不应将实际流行的东西不假思索地奉为值得追慕之物,因为这样做只是在随波逐流,缺少独立思考与自我反思的能力。

这正如在帝制时代,由于儒学长期处于官学的位置,并且科举考试有机会让读书人出任为官,因此绝大多数读书人都会在表面上成为程朱理学的信徒,俨然以希贤希圣自任,极力表现出一副卫道士的模样。而到了讲求西学蔚然成风的时代,以西方文明的标准来打扮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流行的西学主张自然也会让人趋之若鹜。虽然近代西学与程朱理学在内容上差异极大,但其众多追慕者的动机与诉求并无二致。这也正像鲁迅的老师章太炎指出的,“中国士民流转之性为多,而执著之性恒少”,“彼新党者,犹初习新程墨者也,是非之分,美恶之辩,惟以新为荣名所归。故新党之对于旧党,犹新进士之于旧进士,未有以相过也”。

那种缺乏自主意识的效仿、迎合西方文明之举,极易导致对西学的认知长期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端的层次,即时常将各种新名词与新概念挂在嘴边,但对其内涵与外延知之甚少。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服膺者主动认同近代西方列强的价值观,在以西方文明在华代言人自任的过程中把自己也想象成西方文明的一分子,觉得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活动让自己也有与荣焉。鲁迅指出,当时欣赏西方文明之士有两个明显特征,一为“崇强国”,一为“侮贱民”。前者的表现形式就是认为西方列强支配全世界实乃天经地义,西方列强国力之强盛让自己欣欣鼓舞,甚至感到自豪。后者的表现形式就是对那些遭西方列强侵略的国家极尽嘲讽,认为那些国家因为弱小而被侵略实乃自作自受,更不会去同情当地民众惨遭殖民之苦。在鲁迅看来,秉持这样心态的中国知识阶层恰忘记了中国其实也正在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大多数国民的处境与那些已经被殖民的国家之国民其实并没有太大差别。

因此,鲁迅希望有志之士树立主体性与自觉性,与各类“伪士”划清界限,传心声于四海,使中国文明重新焕发活力:故今之所贵所望,在有和不众器,独具我见之士,洞幽瞩隐,评鹭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愠也。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

(本文为《文明等级论的表与里》一书序言,刊发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图书单

《看见故宫》
余辉 冯明珠 徐琳 王健华 丁孟 马顺平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今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故宫珍贵文物藏品数量大,品类丰富,堪称国内博物馆界之最。这本书精选两岸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逾百件国之重宝,分为陶瓷、青铜器、玉器、书法、绘画等模块,文物年代从古老的夏商周直至百年前的明清,横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程。六位国宝守护人亲述自己研究国宝的趣味心得,思考文物背后的奇人逸事,用生动的文物故事诠释中华文明。

《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
邢海洋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从科普和人文的双重视角穿行于天、地、人之间,展现200万年间大自然的伟力与沧海桑田之变,回溯华夏文明的起源,感受人类与天、地的关系。从整个地球到中国大地,今天我们周围的一切与200万年前截然不同,但古今之间却从来没有失去关联,这里包含着大自然的奥秘,也蕴含着人类的奋争。“让历史告诉未来”这一口号,永远不会失去价值,因为回顾过往,重要的价值在于获得知识,也作用于当下。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
[法] 菲利普·阿吉翁 等 著
中信出版社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等人从创新的角度探寻经济发展的动力。书中用阿吉翁独创的“熊彼特增长”范式,诠释当下重大经济谜题,包括可持续增长、不平等的根源、竞争和全球化、技术革命、中等收入陷阱、气候变化等。作者指出,只要创新不竭,更公平和更具包容性的社会繁荣就能实现。(□记者 蔡可心 整理)



的两个衙门因手握巨额经费,成为明清最富庶也最腐败的机构。更颠覆我们想象的是,当时的普通人根本无法全程利用运河北上。过了江苏淮安清江浦,多数旅客必须改走陆路,连部分粮船也需分段转运。这条被视为南北动脉的大运河,实际通航条件比想象中更严苛。可见,水的管理不只涉及技术层面,更是制度与权力的体现,在展现古人高超的水利智慧时,也暴露出社会中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为理解传统社会的水制度文化提供了生动注脚。

在流淌中寻找永恒

清末以后,运河完成了漕运使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如今,很多地方在探寻运河的旅游开发利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运河,已不仅是区域性的水道,更是全人类共同的珍贵遗产。物质遗产的修缮维护固然重要,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更为复杂,它需要传承者的代代相继,需要在“活化利用”与“保持本真”之间寻求平衡。真正体现地域文化精髓的,往往是那些深深植根于水土的方言、民间饮食、民居建筑等元素。这些文化印记的形成,无一例外都与当地的水文环境、物产资源紧密相连。

与历史上的运河相比,今天的水系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任何关于水文化遗产与开发的规划,都必须建立在对历史原貌的准确认知基础上,否则难免陷入盲目开发的困境。

不仅运河,黄河、长江等江河均是如此。葛剑雄认为,江河孕育了人类文明,人类应该延续江河的生命。尤其是黄河流域所拥有的人文资源、历史遗迹、文化精华,是长江流域或者其他流域不能替代的,在文化传承中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文明所不能替代的。如果从物质文明层面观察,可能会觉得黄河已经衰老,但如果从精神文明层面,看到人类文化遗产的话,就会对黄河充满信心。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似乎正在逐渐遗忘这些古老的文明遗产。当河流被裁弯取直、被水泥硬化,当湖泊湿地不断萎缩,被切断的不只有自然的水流,还有水与历史、与文明本源的联系。如今,每一条静默流淌的江河,无论是否面临污染或断流的威胁,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和文明的载体。因此,守护它们不只关乎环境保护,更是一场文明赓续。

让中华文明的血脉在江河奔流中永续流淌,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责任。

水流浸润的精神世界

水不仅塑造了文明的物质基础,更深刻地参与了精神世界的构建。“同饮一江水”远非简单的地理描述,而是文化认同的生动写照。长期生活在同一流域的群体,通过共同的水源滋养,形成了相似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建立起属于这片水域的独特文化。

这种精神塑造首先通过语言显现其力量。在同一个流域内,即使空间距离遥远,密切的人际交流仍然能够让方言保持一致,而“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文化现象,则在大河流域的连贯性中得到了完美诠释。黄河中下游能成为华夏文明公认的“中原”核心,正是得益于这种以水为纽带文化整合,才能将散落的“风”化为共同的“俗”。

在认知有限的古代,既滋养生命又毁灭家园的双重属性,催生了复杂的水神信仰体系。从黄河、长江等“四渎”的官方祭祀,到李冰父子、妈祖等地方水神,形成了完整的神灵谱系。1781年黄河决口后,乾隆皇帝特派专员探寻河源以便直接祭祀,这种敬畏虽然并不能消除水患,但在客观上促进了水源的保护,也体现出精神信仰对现实行为的深刻影响。

对水的管理还催生了独特的制度文明。葛剑雄曾实地见证过,在北非的沙漠绿洲,基于《古兰经》誓言的水资源分配彰显着神圣与公正;在古达米斯古城,古老的草标计时法调节着水流分配。这些制度不仅是技术安排,更是文化传统的体现。而在中国古代,水管理制度更是中央集权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以京杭大运河为例。这条纵贯南北的人工水道,最初的开凿动机是保障粮食供应。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而周边农业无法支撑都城庞大的粮食需求,只得依靠江南漕粮北运。但将粮食绕道洛阳再转北京的方案既费时又缺水,于是元朝巧妙利用隋代运河基础,在山东段打通新航道,形成了直达北京的京杭大运河。可以说,没有这条水道,北京就难以成为三代帝都;而正因为定都于此,王朝才不惜代价维持运河畅通。

在运河山东段,由于水源困难,南四湖、洪泽湖等水源作为“水柜”蓄水济运。为此,山东设立“泉老”专职管理每一处山泉,确保泉水全部引入运河。在漕运任务完成前,即便周边农田干枯,也严禁民间取水。与此同时,运河也成了权力与腐败的温床。为保障漕运,民间商船被禁止使用运河,催生了贿赂官员、夹带私货的乱象。管理黄河与运河

水的史诗，文明的镜像



□ 本报记者 蔡可心

当迁徙季的候鸟年复一年掠过黄河入海口,当长江畔的白色灯塔目送万吨巨轮驶向深海,我们或许很少会想到,在这些司空见惯的水景背后,流淌着一部怎样的中华文明史。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在《江河流淌看中国》一书中给出了一个深邃而流动的视角:文明的故事,首先是一部关于水的史诗。

文脉兴衰的水系法则

水,是人类生命存续不可替代的前提。在早期人类还没有具备生产能力的时候,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水量已经远超直接饮用的范畴。正是这种对水的原始依赖,驱使最早的人类群体走出东非大裂谷,开启了跨越非洲的迁徙征程。在文明曙光初现之前,水就已经默默划定人类活动的基本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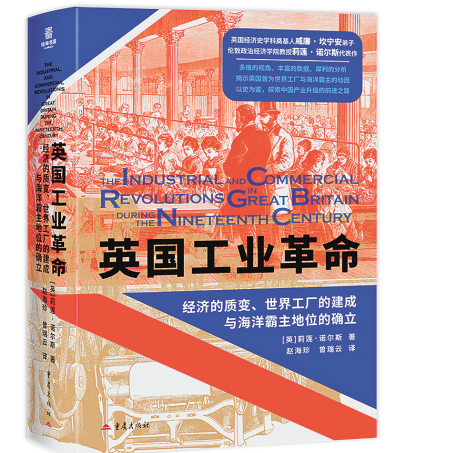
生产力低下的年代,雨水雪水受制于天时与地理,地下水开采依赖技术工具,植物体内的水只能应急。真正支撑文明诞生的,是那些流淌在大地上的河流。它们为生息繁衍提供了最稳定、最易获取的水源,一条水量充沛、流域广阔的河流,足以滋养一个庞大的人类聚落。

但是,水的存在本身并不会必然催生文明。关于这一点,葛剑雄揭示了一套精密的自然选择机制,比如:适宜的气候将古文明限定在北温带,合理的地形排除了高原和沙漠,肥沃的土地和水的利用条件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放眼全球,黄土高原与冲积平原展现出独一无二的文明孕育优势。相比之下,尼罗河虽然足够长,但两岸很大范围内都没有适合耕种的农地。从水的利用条件来看,古罗马为引水入城,不得不耗费巨资修建绵延数十公里的引水渠,而华夏大地的都江堰能够获得成功,不仅源于先民“乘势利导”的智慧,也得益于河流本身的天然优势——能够以较小代价实现自流灌溉。现在回过头看,这种地理禀赋的差异,早在文明起步阶段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河流的空间格局进一步塑造了文明特质。黄河与长江的近距离共生,构建了中华文明独特的资源互补机制;两河流域文明在交流中成长;而美洲三大文明因隔绝成为历史陈迹。作为天然通道,河流既是拓展生存空间的血脉,也是国家形态的催化剂。

文明并非人类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水的物质基础上,人类智慧与自然条件相互调适的产物。葛剑雄认为,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事先规划好的,完全有意识发展的结果,因此,人类与河流的互动往往起着很大的作用。读懂水的物质属性,不仅是为了理解过去,也是为了找回那种顺应自然、巧用自然的东方智慧。

当机械降临田园：英国工业革命的启示



□ 马铭泽

英国经济史学家莉莲·诺尔斯的《英国工业革命:经济的质变、世界工厂的建成与海洋霸主地位的确立》一书展示了一幅画作。画面的右下角,两位传统装扮的英国绅士在田园草地上眺望着远处。顺着其中一位绅士的手势,两人驻足观看的,是一个大型的复杂机械。工业革命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降临在了英国的田园。

画上的机械就是诞生于1712年的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纽科门蒸汽机。实际上,工业革命是一场由机器驱动的经济变革。其中,英国本土的机器发明成为推动变革的核心因素。为什么这场震动世界的工业化浪潮起始

于一个当时仅有900万人的岛上的国?工业革命究竟是如何影响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格局?诺尔斯以机器的发明为切入点,为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为特殊的“革命”诞生和发展的原因,提供了一种不完全等同于教科书的解释。

诺尔斯认为,工业革命从不是片面或静止的,而是多重因素层层重叠累加形成的结果。这其中,首要的因素就是技术带来的社会转变。技术引领的英国社会在工业革命中包含着六个显著的变化,分别是:机器制造业的崛起;炼铁技术的发展;水力与蒸汽动力的应用;纺织业等大型化学工业的建立;煤炭开采业的发展与运输工具的快速发展。这六个变化不仅是英国社会产生剧变的底层框架,也是我们观察英国工业革命一条客观的线索。

在这条线索之下,英国的工业革命被诺尔斯区分为两个具体的阶段,分别是碎石路和运河时期(1770-1840)以及铁路时期(1840-1914)。而在这两个独特的时间段,以机器为核心的大工业为英国整个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原有纺织业等行业的机械化转型;反映在城镇的扩张和工人群体的形成;反映在商业贸易的市场化进程;也反映在法律、教育与整个社会的转型。从本土化的发展期到全球化的扩展期,工业革命不仅帮助英国崛起为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工厂,更帮助其积累了财富,减轻了战争带来的压力,使其在与拿破仑政府长时间的对抗中取得胜利。而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一部分英国产业工人又带着自己的先进经验走向欧洲,帮助满目疮痍的欧洲大陆建立了全新的工业体系。可以说,于

内于外,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就都实属斐然。

蒸汽滚动的辉煌背后,工业革命剧烈的社会变动带来全新的时代问题。环境保护、工业规范、公共卫生、妇女权利、儿童教育也因工业革命而变成全社会的议题。本书在相对有限的篇幅中汇集了大量的史料,通过翔实的案例,在展现宏观危机的同时,也用一个个具体的事例去阐释工业革命背后的种种问题是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以及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人们作出了哪些努力。

在本书中,诺尔斯主要关注到两个工业革命带来的宏观转变。其一便是工业革命对英国商业社会形态的塑造。工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著的,不论是宏观的商业法律的确立与规范,还是微观层面各种商业协会、工人团体和社会福利组织的涌现,都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这些社会群体的冲突与媾和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的经济政策——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走向尾声,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逐渐走向时代的舞台。

19世纪的工业革命并不仅仅为英国独享。这又引申出了作者强调的第二个转变——英国工业革命的全球化影响。从公路到铁路,从英国本土到殖民地。作者敏锐观察到英国人在工业革命时代对交通运输的创新,深刻地改造了欧洲的交通模式。通过对大量数据的比照,作者认为运输业发展带来的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张也推动了英国贸易政策的放宽,从而开始逐步重塑全球的贸易体系。此外,英国宏观贸易体系的变动也影响着殖民帝国的转型,工业革命使得殖民地从帝国难以维系的累赘摇身一变,成为富含各种工业资源的宝库。对于